

二十世纪 中国文学批评形态

景国劲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景国劲 著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形态

当代中国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形态/景国劲著.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2.9 (新纪元文丛 徐传武主编)

ISBN 7-80170-115-1

I. 二… II. 景… III. 现当代—文学—研究 IV. 121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2746 号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形态

景国劲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邮政编码: 100009

济南申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责任编辑: 陈德仁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 12.4 印张 320 千字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000 册 书号: ISBN 7-80170-115-1/I·1

定价: 25.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文学批评形态的现代转型.....	(1)
一、20 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形态的形成	(1)
二、文学批评的“世纪”转型.....	(8)
三、20 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形态的流变	(19)
第二章 “五四”文化批评	(32)
一、“五四”文化批评界说.....	(32)
二、历史的先声	(35)
三、泛人文主义批评	(41)
四、“文学革命”批评话语.....	(47)
五、“五四”文化批评的影响.....	(54)
第三章 新人文主义批评	(59)
一、文化的选择与批评的冲突	(59)
二、新人文主义批评的文化品格	(67)
三、“学衡”批评.....	(74)
四、“道德”批评.....	(80)
五、“格律”批评.....	(89)
第四章 审美印象批评	(96)
一、审美印象批评的发生与发展	(96)
二、审美印象批评的文化品格.....	(106)
三、三派批评的倾向与类型.....	(122)
四、诗学批评.....	(136)

第五章 社会历史批评	(151)
一、社会历史批评的演变.....	(151)
二、社会历史批评与现实主义美学.....	(158)
三、社会历史批评的表征.....	(169)
四、主观批评与客观批评.....	(183)
五、社会历史批评的变异：政治批评.....	(194)
第六章 历史文化批评	(213)
一、历史文化批评的流变与特征.....	(213)
二、思想文化批评.....	(221)
三、主体文化批评.....	(230)
第七章 文体叙事批评	(244)
一、文体叙事批评的自觉.....	(244)
二、文体叙事批评的深化.....	(258)
三、“汉语”批评话语.....	(272)
第八章 后现代文化批评	(290)
一、从新潮批评到先锋批评.....	(290)
二、“解构”批评.....	(303)
三、“女性”批评.....	(308)
四、文化诗学批评.....	(314)
五、大众文化批评.....	(325)
第九章 从泛政治到泛文化	(342)
一、世纪批评的泛政治倾向.....	(343)
二、世纪批评的泛文化倾向.....	(347)
三、民族身份认同的焦虑.....	(354)
附录：主要参考文献	(362)

第一章 中国文学批评形态的现代转型

一、20 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形态的形成

文学批评是对以文学作品为中心的一切文学现象的分析、阐释和评价、判断，文学批评中的这些理性活动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依循着一定的思维方式，观念尺度和方法形态进行的。面对复杂的文学现象，文学批评的分析、阐释和评价、判断，必然要体现出不同的操作方法和价值取向，由此形成不同的批评形态。对于“形态”概念，人们很容易作出具有普遍学理性的解释，但对复杂多样的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却由于文学批评形态自身范围的大小、内涵的宽严，以及研究者不同的学术视野、角度、标准和理论与实践形成的差异性，而对文学批评形态的划分也呈现为多种多样的视角、标准及其类型。这里有必要对已经产生的文学批评形态的划分予以陈述。

从方法体系角度划分文学批评形态。首先是关于外在方法与内在方法的划分，如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一书，就将文学研究方法区分为外在与内在两种方法体系。外在方法关注的是文学的外部关系，考察文学背景及其文学与外部因素的复杂关系；而内在方法则关注文学的内部结构和形式，考察文学内部结构和形式的运动、组合等关系。这两种不同的文学研究方法在具体的文学研究或批评实践中，就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批评形态：外在（部）批评形态和内在（部）批评形态。这两种批评方法体系在具体层面上，又呈现为多样化的具体批评方法。从文学与新兴

学科联系的角度看,有传播学批评方法、符号学批评方法、系统论批评方法等;从文学与一般学科的联系的角度看,还有文学心理学方法、文学社会学方法、文学文化学方法、文学经济学方法等。从西方二十世纪文学批评历史来看,又有结构主义、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现象学批评方法、精神分析批评方法、神话——原型批评方法,以及社会历史批评方法、比较文学批评方法、后结构主义批评方法。在这些具体的批评方法背后,都隐含着各自依托的哲学思想和方法,在“方法”中又潜在地参与了与此相关的价值尺度、理性观念等。因此,这些方法在文学批评运作中,又很容易形成各式各样的文学批评形态或模式。

从结构关系角度划分文学批评形态。比如,从文艺主客体关系出发,把文艺批评模式划分为主体性批评和客体性批评。主体性批评,注重于文艺的主体因素,实际上从观念上把文艺的本质视为艺术家的主体意识的辐射和物化;客体性批评,强调文艺的客体因素,实际上从观念上把文艺的本质视为艺术家对外部对象世界的主观反映或摹写。自从美国的艾布拉姆斯提出文学批评的作品、宇宙、作家、读者这四大要素后,许多研究者把文学的结构关系视为一个系统,分别就四要素的组合关系,划分为不同的文学研究系统。比如,有的研究者认为,整个文学系统就是以文学作品为存在核心,以文学作品的内涵和外延关系构成的一个有机系统,并分别就文学作品与作家创作、与读者接受、与社会文化背景的关系,划分出文学批评的四种形态。一是从文学作品的内涵关系即本体结构着眼,着重考察文学作品内在因素有机构成及文本意义的“本体阐释批评”;二是从文学作品与作家创作的关系着眼,着重考察作家创作意图和心理动因,他的生活经验、情感经验和精神个性如何孕育成为“这一个”作品,可称为“考证批评”;三是批评家完全设身为读者,仅仅从自己对文学作品的审美感受体验出发加以阐释评论,是为“体验批评”;四是从

文学作品与社会文化背景的关系着眼，着重考察文学作品如何反映了社会生活面貌和社会文化心态，并对这种反映的正确与否和评价意义进行评判，可称为“社会文化批评”。

从文化思潮角度划分文学批评形态。比如，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批评界言说较多的不是某种以“创作方法”命名的批评形态，而是科学研究趋向的文化思潮，即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比如，有的研究者从三个方面指出了这两种相对立的批评形态的特征。首先，关于文艺的学科对象方面，科学主义视批评对象为物理现象、生理现象，以探求科学的认识；而人文主义则视批评对象为人文现象，以人的生命存在及其活动为本体。其次，在批评的操作方式上，科学主义采用实验的、测量的方法，追求的是对对象认知的精确性、严密性和量化；人文主义则采取了阐释的方式，主张在某种哲学观念和文化意识的导引下，深入阐释文艺作品的精神价值、文本的内在意义与审美魅力，反对客观描述和技术操作。再次，在批评的价值尺度上，科学主义排斥文艺作品的价值尺度；人文主义则专注于文学的社会——人的意义，承认批评的价值尺度，对作品的审美价值进行评价。还有的研究者，结合中国当代批评与文化背景的关系，指出科学主义与个性主义批评模式的相互消长及其对立特征，同科学研究中种种严格的论证与事实检验相比较，个性主义文学批评完成于批评家个人的想象、思辨或联想之中；同科学知识这种世界通用的语言相比较，个性主义文学批评却往往受制于批评家个人文化构成和情趣爱好；同科学家共同体所普遍遵从的法则相比较，个性主义文学批评个体的洞察力与创造力则是首要因素；同科学研究中尽可能客观的事实描述相比较，个性主义文学批评中毫不回避个人的好恶与价值评估。最后，同科学研究中的冷静、理性、精密、一丝不苟相比较，个性主义文学批评则充满了情感倾向和富有人情味。

从功能类型角度划分文学批评形态。有的研究者提出了“理论批评”与“经验批评”的新颖见解，认为传统的批评形态是经验批评，而现代批评是理论批评。传统的文学批评样式，主要有两种，即评点、妙悟式批评和实证式的考据、注疏和索隐式批评，它们都属于经验批评形态。它们主要表达一种阅读中的审美经验，却缺乏抽象分析和逻辑思辨，缺少理论的系统性。现代的理论批评，是以某种理论为基础，其结论是某种理论内涵的展开，被评论的作品主要是某种理论意蕴的“例证”和“见证”，批评话语的基本词语是“理论术语”，内在结构是基于这些理论术语之上的“逻辑构成”，即推论式关联而非联想式关联。有的研究者划分文学批评形态为“实用型”和“学院型”两种类型，认为一种是流行于报刊上的各类书评、文评和即兴式的单个作家任凭串联评论，这种评论往往是职业评论家或文学爱好者为推荐介绍文学新作而写，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另一种是以发现问题、提出并回答问题为主的总体性文学评论，这种评论具有比较鲜明的学院派风格，其特点是自主性、学理性、规范性和优雅性。有的学院派提倡者上为“新学院批评”，将以心态的自主性、批评的学理性、阐释的公允性、学术的规范性和思维的创造性为追求目标，并对这种批评形态的九种品格和特征予以具体论述。

从批评历史和批评主体角度划分文学批评形态。有的研究者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的结构系统及批评主体的角度，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批评家划分为四组，以此确立了四种批评流派和模式：第一是文化——思想型批评家，主要有鲁迅、胡适、陈独秀以及胡风、冯雪峰等；第二是艺术——印象型批评家，主要有周作人、沈从文、李健吾、朱光潜、梁宗岱和李长之、李广田、吴组缃等；第三是主观——情绪型批评家，主要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和钱杏邨；第四是社会——现实型批评家，主要有茅盾、周扬及延安批评群体。有的研究者则着眼于当代青年批

评家，并将他们划分为三种批评类型；感悟型，如郭小东、吴亮、李庆西、赵玫、王绯、朱向前等；学科型，如陈思和、南帆、宋耀良、陈晋、黄子平、季红真、王晓明、许子东等；理论型，如靳大成等。

综合角度的文学批评形态划分。如有的研究者将文学批评史上出现的批评形态，划分为：伦理批评、社会历史批评、审美批评、心理批评、语言批评、阐释学批评、人类学批评、文化学批评等。有的研究者从批评角度、价值取向和作品特性等综合角度，将文学批评史上出现的文学批评划分为五种类型。第一种是“审美型”，它从审美的角度来品评文学作品，以审美价值作为评论的中心和归属，它与文学作品的审美特性相对应；第二种是“功用型”，从社会功利的角度评判文学作品，以作品产生的社会功用价值作为评论的出发点和中心；第三种是“认知型”，它从认识的角度来考察文学作品，把文学作品看成是对社会生活的“摹仿”或“反映”，以作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历史内容为评论的重点和中心，以揭示作品的历史事实及其意义作为评论的旨归；第四种是“技艺型”，它从艺术技巧的角度来评判文学作品，以文学艺术创造过程的构思及传达活动以及传达过程中的技巧和法则作为评论的中心和归宿，考察艺术表现是否完美地表现了艺术的内容并起到了“传神”的效果；第五是“史学型”，它以史学的方法来考订作家作品，以历史的眼光来考察文学的发生、发展过程及其历史的继承关系和相互影响，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科学的文学史，从中揭示出文学产生、发展的原因和规律，从而进一步认识文学的本质和功能。

我们所理解的文学批评形态是批评的深层结构——观念体系和批评的表层结构——方法方式的整合，它整合于对文学作品及文学现象的具体运作中，呈现为一种批评状态、框架和规范。批评的观念体系由三层面构成：一是理论体系形成批评的“理论背

景”；二是具体的批评观念形成“批评理论”；三是批评的价值取向形成批评的“文化意向”。这三个层面共同受制于一定的“文化语境”，特别是批评的价值取向直接沟通文化语境而呈现为批评的文化意向。因此，文学批评既是一种文学活动、文学现象，同时也是一种文化活动、文化现象。批评的方法方式也由三个层面构成：一是批评方法；二是批评视角；三是批评方式或体式。批评的“方法”实质上已不仅仅指向一种技术性的操作方法，其中也隐含了“观念体系”的内蕴，或者说“观念体系”已隐匿在“方法”之中，它作为批评形态的“表层结构”中的首要层面直接与“深层结构”产生沟通关系。这三个层面共同受制于“文本语境”。可以说，文学批评形态又是“文本语境”形态与“文化语境”形态的中介性产物，它沟通了本文与泛本文的联系，同时也是这二者关系的具体呈现。明确文学批评形态的构成和结构关系，便于在文化格局和批评格局中对批评形态的定位及其划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在借鉴和分析上述列举的诸种批评形态论述中，找到适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形态实践的研究框架和操作规范。

事实上，任何一种对批评形态的划分都有其合理的成份，但当我们切入历史过程中的具体批评形态这一理论和历史相整合的层面时，问题就不是那么简单了。首先处在历史链条上的批评形态，总是具有历史感的，同时也是鲜活易变的。在这里，既有历史阶段相对完整性对批评形态的制约、规定，同时，这种历史阶段又不可能完全切断某种批评形态的转变和演化，这是我们研究、划分批评形态时难以回避的。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制约要素就是文化语境，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化语境制约着具体的批评形态的形成和变化，致使批评形态中包含了浓郁文化话语的成份；反之，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化语境也有着不同的话语内涵。象“五四”时期与八十年代的文化语境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两个历史时

期出现的批评话语也有诸多相通之处，但这些批评话语的相似并不能相互替代或等同，以至于划分批评形态时合二为一，不加区别。其次，批评主体的变易因素对批评形态的制约和规定。尽管批评形态更多地着眼于本文语境与文化语境间的联系，而将焦点落在具体的批评本文上，但是，批评本文中隐含或活跃着一个生命体——批评主体，本文毕竟是主体操作着的生成物化形态，而不仅仅是一连串符号的相连。某些批评形态的产生与批评家的历史性变迁情形，无疑影响了由他实践着的批评形态的演化，甚至再生出另一种与此相关但又不同的新的批评形态。某种批评形态尽管有着客观的规范，但在特定历史阶段，它总是由一些批评家集团言说实践着，最终形成了一种形态。再次，批评体系的制约、规定与批评形态的关系，也应当成为我们考虑的一个因素。尽管每一种批评形态都可依附于一种批评背景和体系，但这种体系只是一个相对的体系，它不具备对具体批评形态的绝对规定作用，否则，处在历史中的批评形态也等同于批评体系了。比如，世纪之交时期，由梁启超和王国维分别奠定基础而又一直演化、贯穿本世纪的社会批评与审美批评，从宏观角度看，这二者无疑形成了两条重要的批评线索，两大批评体系。如果不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本世纪的批评也就主要指向了这两种形态了。事实上，情况远比这种宏观的“抽取”复杂和丰富，在其演变历程中，各个体系间又渗透进具体的历史的文化话语，每一话语中又包含进了不同的视角和操作方法，甚至有着质的区别。这就需要作出具体的历史分析，在其中寻找和剔别出不同的因素，由此进行具体批评形态的研究和划分。总之，属于批评史范畴的批评形态，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封闭的自足体结构，而是一个不断历史化的演化体，各个历史阶段、理论体系和批评家集团及其批评本文形成的批评形态，是一个复杂、丰富的文化变体，只有具体的历史的考察，才有可能看到每一批评形态间的对立性、联系

性、以及规范性、变异性。

二、文学批评的“世纪”转型

日本文学批评家柄谷行人曾就“时间”问题，提醒人们注意非西方国家采用西历记年的问题。他认为这种以世纪记年的西方日历是按照一个基督教的叙述而组成的，在西历中，每一个世纪，也就是每一百年都具有一种宗教仪式意义，是一个时期的死亡与复活。对此，李扬指出，当我们使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这些词时，我们不仅仅是在使用一种客观描述，而且是给一个西方叙事以肯定。因为，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实际上构成了‘传统’与‘现在’的区别”^①。当我们把“世纪”这个概念引入近百年的中国文学批评形态这一框架中时，“二十世纪”意味着这样一些历史可能性：一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世纪”的中国文学批评，标志了近百年中国文化（自然包括了文学批评）的“现代化”的追求历程。作为一种“历史”，它有其自身的“时间”性，即时期性及其结构和规律。二是它标志了“传统”与“现代”的区别，引伸到文学批评中，即是“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也是“现代形态”向“后现代形态”的转型。因为一个“世纪”实际上存在着由始至终的两个“世纪之交”，由此也存在着两次“转型”。

那么，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形态来说，在“二十世纪”这个时间链中，标出了本世纪文学批评发展的五个历史时期：世纪初期文学批评形态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具体生成了三种不同形态的批评体系，影响和制约了近百年文学批评发展的总体主导格局；“五四”及三十年代，是文学批评形态发生现代转型之后的发展期，同时也是繁荣期；本世纪中晚期，即四十至七十年代，是文学批评的持续期，社会历史批评发展到成熟和极

致状态，占据着批评的主导地位；八十年代是文学批评形态的繁荣期；世纪末即九十年代是文学批评形态的转型期，即由“现代”形态向新的批评形态转型。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形态是在中西文化大汇流的文化背景下，充分借助西方哲学、美学、文学理论与方法，并在科学精神引导下生成和转型的。以“重估一切价值”为核心的现代思想，给予文学批评以强有力的思想支援，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形态作为传统文化中的组成部分自然也在“重估”之中。传统批评在思维和运作上的特点，诸如妙悟、点评、印象等美学特质，基本是一种个体化的自足形态，它与世纪之交的文化氛围形成较大反差，远远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了。因为二十世纪初期需要批评的思想，需要具有穿透力、创造性和思辨性理论深度的批评。在西方近现代思想的滋养下，具有近现代品格的批评家和批评文本应运而生，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鲁迅的《摩罗诗力说》以及周作人的批评文章，不约而同地都带上了一个显眼的“论”字，从批评方法到文体样式都发生了现代转型。

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有两种基本形态。一是建立在批评家个体审美趣味基础上，并以此为依据和准绳展开对作品的品鉴。实际上这种感悟印象式批评形态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阅读”，而不是严格的“批评”，所显示的是批评家文学修养的深浅和艺术感悟能力的高下，以及“自然”语言传达这种主观感悟的张力。可以说，这种批评形态将批评家对作品体验的灵性发挥到了极致。二是建立在史实与作家作品间实证式关联基础上，对批评对象作出注疏、考辨、索隐。这两种批评形态的共同特点是缺乏“理论”，依靠的是个人人生和艺术“经验”或客观“史实”，缺少宏观思辨的论证色彩。而以梁启超、王国维和鲁迅、周作人为代表的世纪初文学批评，表现出明显的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

特征。首先，他们的论文以西方具有现代意义的理论体系作为批评构架，所依据的不是个人式的“经验”阅读，而是一种更富理性色彩的“理论”阅读，即“理论”参与了“阅读”活动。批评不仅要“入乎其内”，更重要的还要“出乎其外”，从而获得一种理论深度——思想深度，发现批评对象的思想理论价值。其次，文学批评至此具有了宏阔的文化与理论视界，对文学作出意义阐释，由此生成了批评标准，显示了批评的存在价值。再次，在批评思维层面上以逻辑思维代替传统的悟性思维，科学理性参与思维活动，批评对象的内涵的展开，依靠的是概念和推理的力量，体现了严密的逻辑关系，这与传统批评思维以内心体验为主的感悟思维有着质的差异。第四，在批评文体上，现代批评形态已经不再是传统的评点式、语录式、读后感文体，而是宏篇大论式的“论文”。总之，中国文学批评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都与“理论”分不开，即西方现代哲学、美学、文学理论和方法成为批评的参照系，批评呈现为“理论化”批评，有的学者将其概括为传统的“经验批评”向现代的“理论批评”的转型^②。

梁启超、王国维、鲁迅兄弟的现代形态的文学批评，同时生成了中国二十世纪初期三种不同的具体批评形态：社会政治批评、审美批评和主体批评。梁启超站在启蒙主义立场上，倡导“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把“小说”与“群治”联系起来，有意夸大文学的“革命”作用。显然，他的目的不在于文学本身，而在于以文学手段达到革命目的，文学是为“革命”服务的，即从属于“革命”，形成了从社会政治角度审视文学艺术的批评形态。王国维则与此相反，他淡化了文学的社会政治色彩，从纯学术角度将文学置于审美视域中进行美学的“理论”评说。他借助叔本华和尼采的哲学和美学理论来阐释《红楼梦》的精神价值和审美意义，解除了文学与政治的紧张关系，建构起了文学的审美批评形态。鲁迅和周作人身处日本文化环境，同时也受到

了尼采、克尔凯郭尔及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以《河南》杂志为主要阵地，提出了“立人”、“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思路，初步建立了“人”学的文学理论批评体系，及其主体批评形态。他们以“人”为主体的文学批评，已经将梁启超的近代意义的启蒙主义发展到现代意义的人道主义——显示出了人道主义、个性主义的雏形。

“五四”及二、三十年代是二十世纪文学批评形态“现代化”得到较为充分发展和繁荣的时期，因为文学批评的发展，是在某种文化氛围中实现的，同时它又仰仗于文学创作的繁荣和发展，文化语境和批评对象是文学批评得以发展的两个必不可少的客观因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二、三十年代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发展和繁荣才是同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及文学革命时期，启蒙主义成为当时的文化主潮，与此相对应，也形成了启蒙主义文化批评形态，即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建构起了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批评框架，其内涵的展开则是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思想。当文学批评寻找到自己的批评对象——新文学实绩时，文学革命时期的理论倡导开始转向对具体文学创作的倡导和批评。从批评角度看，新文化统一战线的分化，不仅标志着二十年代知识分子的不同文化态度和文化选择，同时也标志着不同批评形态的生成——从统合的“文化批评”中分化出不同的具体批评形态。相对世纪初产生的社会政治批评、审美批评和主体批评，这个时期形成的以文学研究会成员为主体的社会历史批评，以创造社会成员为主体的审美印象批评，和以学衡派为主体的“新人文主义”批评，已经建立了各自的批评形态框架，并使之具体化。到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参与社会历史批评建设，新月派特别是其主将梁实秋进一步发展完善了“新人文主义”批评，京派批评家将审美印象批评进一步规范化，这三种批评形态真正在对具体文学现象的批评实践中走向了成熟。

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是本世纪文学批评形态的持续期，“持续”的事实是：一、此前的文学批评形态基本上没有多少发展，且处于弱化和被淡化、消解的地位；二、与此相对应，社会历史批评占据了文学批评的统治地位，贯注了单一的理论营养，形成权力话语。社会历史批评原有的人道主义和写实主义理论被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乃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代替，“为人生”被“阶级分析”所代替，真实论和典型论被倾向性和类型化所代替，形成了泛政治化和泛现实主义的双重泛化倾向，其他文学批评形态的充分发展失去了可能。

八十年代是中国二十世纪文学批评形态最为繁荣的时期，但却不一定是充分发展的时期。在“改革开放”的社会文化总体语境中，批评生产力得到充分的发展，但由于批评形态往往以“思潮”、“效应”的面目出现，“创新”成为标示“个性”的“疯狗”追赶着批评家们急于建立自己的理论框架，批评文本的实践并没有更多的被检省的“时间”，显得追赶有余，沉积不够，创造和繁荣有余，发展和完善不足。“时间”观念一直是制约本世纪文学批评发展的一个重要法码，“时间”的魔力与主体焦虑间的神秘关系不但没有获得轻松，反而加剧了二者的紧张程度。在十年的时间里，批评承担着追补中西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程。对中国来说，首要的任务是恢复“文革”前的批评状态，接续社会历史批评传统，对此，必须挽回这一批评形态的名声，于是我们听到了中年批评家为此“辩护”的言辞，文艺与政治关系的“正名”也就自然成为题中应有之义。其次，八十年代的文学批评继续上溯，恢复五四文学批评传统，社会历史批评开始了对政治判断模式的批判，重构社会历史批评，形成了历史文化批评。这个时期，是要尽快从近代走向现代，与西方晚近批评“接轨”和“对话”。康德、黑格尔以及尼采、叔本华美学理论“热”过一阵之后，很快又找到了神话原型理论方法，形式主义理论方法等。